

三川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几个问题

□ 董 磊

三川河地处山西省西北部的吕梁市范围内,由三条支流汇合形成,其中北川河从方山县南下,东川河源于离石区的东部山区,二者在离石城西交汇,并于离石、柳林交界处接纳了来自中阳县的南川河,三条河流汇合后始称三川河。河流横贯柳林县全境,向西直接注入黄河干流。流域内地形东高西低,由于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地形不整合,多数区域沟壑纵横,支离破碎,不便于大规模居住地的建设。但是,这里是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带,黄土深厚,四季分明,在环境相对较好的地域进行小规模农业发展还比较适宜,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与适应中生存繁衍,生生不息。根据考古调查、发掘的资料,三川河两旁的山坡地带,甚至于梁峁山顶均有历代遗存分布,至晚在新石器时代的6000多年以前已经有人类定居于这片沃土,这里的遗存风格独特,其重要性不仅仅局限于吕梁山区的地方文化,对于山西乃至我国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和传统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就三川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发现、研究及其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粗浅的认识,以期对下一步的考古学研究和文物保护有所助益。

一、三川河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简述

长期以来,吕梁山区有限的考古工作未引起应有的关注,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一直默默无闻,随着学术界对黄土高原地区早期农业改变的历程,以及这种改变对整个社会变革所具有的作用有了全新的认识,新石器时代遗存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了。

对吕梁山区新石器时代遗存的认知与晋中地区汾河谷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密不可分,其中

最重要的工作是从1980年开始对太谷白燕遗址的发掘^[1]。白燕遗址的时间跨度较长,不同阶段的文化因素构成也较复杂,综合了南北不同文化体系的特点。要解释其中的深层原因,必须对周边地区同时期遗存进行细致的调查、发掘和研究,于是,学者们开始将目光集中在与晋中盆地东西相邻的吕梁山区。在这种大的学术研究背景下,从1983年开始,晋中考古队与当地文物部门的科研人员一起,开始了在三川河流域较大范围的田野调查,虽然开展这些工作的初衷与商代晚期青铜器或汉画像石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调查和发掘中发现的遗存绝大部分属于新石器时代,因此,客观上开辟了对三川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及相关问题研究的新阶段。

1983年3~4月,由吉林大学师生组成的考古队进入吕梁山区,在当地文物部门的配合下,在三川河流域的离石和柳林进行了调查。工作范围主要集中在离石境内的东川河、北川河和柳林境内的三川河沿岸,这次调查发现了新石器时代至东周几个阶段的代表性遗存,其中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不仅可以划分出不同的阶段,而且每一个阶段的遗存均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这是吕梁山区史前考古学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2]。

1992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离石马茂庄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取得了一批与前期调查相同或相似的文化遗物,时代为仰韶晚期^[3]。

2004年开始,山西西部考古工作在柳林三川河流域展开,对高红商代大型夯土台基遗址进行了发掘。2006年,我们在高红遗址附近的八盘山发现并发掘了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主要遗存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至龙山时期,填补了以前工作的空白^[4]。

除以上几次调查、正式发掘外,近年来,晋陕

蒙三省考古学者联合进行的考古调查工作、刚刚结束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也在三川河流域有新的发现,但这些资料尚未系统整理或公布。

整体来说,三川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工作还不太系统,已经发现的遗存多数为调查所得,进行了正式考古发掘的遗址,揭露面积均较小,对当时文化面貌反映得不够全面。但是,已经获得的资料仍旧透露出这里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色,值得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二、三川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主要遗存概述

对于新石器时代遗址来说,陶器是认识其文化面貌的重要遗存。三川河流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虽然较少,但陶器数量相对较多。我们主要对陶器进行了分析,然后参考相关遗迹的特点,可以确认的遗存代表着五个前后相继的发展阶段,与山西其他地区发现的遗存基本可以对应。

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发现于离石东川河的吉家村和北川河的后赵家沟,陶片具有以下特征:陶质夹砂和泥质陶两种,皆为手制,其中,夹砂陶为红褐色或褐色的罐,器表饰绳纹及弦纹;少量泥质红陶质地细腻,器形以素面钵为主,极少数为饰绳纹的瓮,属于仰韶时期的较早阶段。

第二阶段的遗址较多,在离石吉家村、马茂庄和柳林杨家坪均有发现。这一时期的遗址内保存着半地穴式房子和圆形锅底状灰坑。出土陶器分夹砂和泥质两类,夹砂器物主要是红褐色的罐、缸等大型器物,器表以浅、细的线纹为主,另有附加泥饼等装饰,在器物肩部饰弦纹的器物也较多,此外还有少数素面罐。泥质陶器多数为红色,少数为灰色,器表光滑,除小口尖底瓶等器物外表饰线纹外,主要是素面或彩陶,彩陶的纹样一般由曲线、直线、圆点、月牙、弧线三角等元素构成图案,流畅活泼,动感较强。器类组合为侈口或敛口的深腹罐或缸、重唇口尖底瓶、敞口或敛口钵、宽沿或敛口盆、敛口或盆形瓮等。这类遗存与分布范围广泛的仰韶中期庙底沟文化的特征基本相同,是这一史前时期势力最强大的文化的

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未发现釜、灶、鼎等其他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器物,我们不能确指是调查遗存少所致,还是这一地区有别于其地方的特色。

第三阶段的遗存以离石马茂庄为代表,所见主要遗迹是灰坑。陶器分夹砂和泥质两类,夹砂器物质地多粗酥、厚胎,主要为褐色,微泛黄、灰或红色;泥质陶以橙红色陶为主,也有少量黄、黑或灰色。器表装饰有线纹、篮纹、方格纹和附加堆纹,鸡冠釜耳流行。彩陶特色鲜明,多见红彩,也有褐彩。纹样以垂线纹、蝶须纹、菱形纹和三角和网格纹等元素组成的几何形图案为主。主要器类组合为夹砂侈沿罐、缸、盆和泥质的喇叭口亚腰尖底瓶、小口罐、盆、钵等,小口壶、彩陶的颜色和图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与晋中地区的同时期遗存均属于义井文化的范畴。

第四阶段的文化遗存发现较少,主要是柳林八盘山遗址的发掘中收获的资料。从数量较多的陶器来看,与前期最大的变化是无论是夹砂还是泥质陶均以灰色为主色调,其他颜色的较少。斜或横篮纹和绳纹成了主要纹饰,附加堆纹较流行,主要器类有小口高领折肩罐、宽沿侈口的深腹盆、尊或敛口瓮等泥质陶器和深腹罐、缸等夹砂器物,构成了与仰韶时期不同的器物组合,但釜形甗和鼎较少见。从遗址显露的特点初步分析,应当是与庙底沟二期文化时代相当、地方特色明确的遗存。

第五期遗址见于离石北川河的乔家沟、双务都、后赵家沟和王家坡等地,发现遗迹包括半地穴式的方形白灰面房子、筒形口的袋状坑为代表的灰坑、用陶瓮作葬具的瓮棺葬,是三川河流域较发达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富有特色的陶器,除用由来已久的泥条盘筑法外,鬲足部分用模制,流行分段制坯再结合成器的做法。器物的颜色仍以灰色或灰褐色为主,泥质陶多见竖篮纹,夹砂陶纹饰以绳纹为主。其他纹饰还有附加堆纹、弦纹、划纹等,这些纹饰的数量较少,而且多为辅助性纹样。陶器类别有夹砂的双釜鬲、单耳鬲、直领鬲、敛口甗、敛口或侈口釜形甗和泥质的甗、尊、小口广肩罐、大口瓮、敞口盆等。器物的形制特征与晋中盆地发现的同时期遗存具有较强的统一性。

在第五期遗址代表的时代之后,历史已经超

出新器时代的范畴,进入了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

三、三川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历程解析

在新石器时代中原和北方地区存在着两个大的文化体系,山西正处于二者的交界地区,具有将二者联系起来的纽带作用。三川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五个阶段的遗存也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发生与发展,每一个阶段的特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通过与其他区域遗存进行对比研究,用考古学谱系的方法进行分析探讨,从文化因素的角度解读其整体的文化进程,有助于确认本地不同遗存的时空定位。

在山西中南部地区,既往的考古工作开展的比较多,与三川河流域仅一山之隔的晋中盆地太谷、汾阳一带,分布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对这些遗址进行的不同规模发掘中,发现并确立了与三川河流域五个阶段相应的文化遗存,为解读三川河流域颇引人注目的新石器考古学文化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对比、参考资料。下面我们以时间先后对历史的进程提出粗浅的认识。

第一阶段的遗存较少,存在的时间与关中地区为重心的半坡文化、晋冀等地的后冈一期文化、陕晋豫交界地区的枣园文化接近。在这几个文化对峙的数百年间,相邻区域的文化特点曾数度发生交错或更替,娄烦、汾阳等地存在着属于后冈一期文化和枣园文化的一些因素,吕梁山一线成为不同传统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但三川河流域发现的少量遗存却明确属于半坡文化的范畴,当时的晋陕高原文化具有较强的统一性。

第一阶段之后,晋南地区发生了枣园文化与半坡文化的融合与替代过程,终于形成了强大的庙底沟文化,其势力范围在枣园文化的基础上迅速向周边地区扩展,原来属于半坡文化的关中和晋陕高原首当其冲,全部由势力逐渐强大的庙底沟文化占据,而且席卷了整个黄河中、上游及周边地区。三川河流域并没有经历文化融合和升华的过程,却整体被新兴的文化取代,因此第二阶段的文化面貌具有与中原绝大部分地域相同的风格,主体已经是该文化因素齐全的成熟期,由于本地未进行较大规模发掘的原因,我们还不能

轻易对这个内涵高度统一的文化进行分期,也不能对这一时期本地的特点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估。

一统天下的庙底沟文化是我国史前时期一个不可复制的奇迹,然而,盛极而衰是历史不变的规律,该文化区域范围广大,各地的环境不同,随着相对独立的发展,终于打破了整体的平衡。到仰韶晚期时,庙底沟文化基本全部分化,陕晋豫交界地区进入一个相对萧条时期,而周边地区却兴起了不同特点的文化,形成了新的文化格局。三川河流域自然也不会例外,不过,也许是黄土高原稳定的气候和适宜的自然条件的原因,这里更多继承和发展了前期文化的因素,使用着亚腰形尖底瓶、宽沿盆等器类,发达的彩陶只有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可以与其比肩。但不能忽视的是这里与河北一带的文化交流,尤其是所用的图案接受了部分大司空文化的风格,还有壶类器物的流行。种种迹象表明,这一时期的三川河流域并没有因信息闭塞而减少与外界的联系,而是通过晋中盆地与其他区域保持了文化的同步发展,本地的特点也开始凸显出来。从此开始,特色的延续使后来的文化交流中,这一区域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

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文化发生了大转型,在延续了仰韶晚期开始的分化趋势的同时,不同区域在与周边文化的接触中兼容并蓄,形成了各具特点的文化组合。这一时期,陕晋豫交界地区因与黄河下游文化的频繁接触,引进了一些新的理念,从而步入复兴之路。以三川河流域为代表的吕梁山区,依靠南通中原,北接内蒙古高原的地理条件,接受了陕晋豫交界地区新兴文化因素和河套地区的一些文化因素,与娄烦、汾阳等遗址有相同的时代特点,也有部分与石楼岔沟接近的因素,逐渐形成了以甗式鬲为代表的器物群,从而开启了龙山时期大发展的新时代,而且还为晋南地区陶寺文化的形成输出了新鲜的血液,成为中原与北方文化交流的媒介。

在长期的文化互动过程中,三川河流域与晋中盆地联系进一步加强,到龙山时期,两地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以双鬲的兴起和形制的逐步完善为标志,与敛口甗、大口瓮、尊等为主要成分的器物组合,形成了晋中及其以北地区文化的特

色,进入最兴盛的崭新历史阶段,而且与晋南的陶寺文化、豫西的王湾三期文化及东北河北一带为重心的后冈二期文化和内蒙中南部同期文化有着较密切的交往,确立了在龙山时代诸文化中较突出的地位,乃至后来的陶寺文化衰落以后,这一地区取而代之,成为与夏文化核心区域对峙的前沿阵地,继续为中原、北方两大文化体系的交流作出应有的贡献。同时,长期与北方系统文化的交流,奠定了后来的夏、商、周时期戎狄部族的基础。

新石器时代的三川河流域的遗存整体是中原文化的组成部分,从目前的发现来看,无论年代较早的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还是后来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的义井、庙底沟二期、龙山文化均属于或得益于中原地区既有的传统。但遗存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些个性,即使在庙底沟文化的大一统格局中,陶器仍旧不与中原腹心地区完全雷同,可以看出其独特性和复杂性,以至于到商周时期成为与中原文化相互对峙的部族聚居地,但是,目前的资料还不足以让我们对此作出更深层次的诠释。

四、三川河流域新石器

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几点建议

通过对三川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情况和谱系的分析,我们得出了基本认识,下面对今后应该如何加强对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提出一些不太成熟的建议。

首先,需要对包括三川河流域在内的整个吕梁山区进行更加详细的文物调查,而且不能仅仅局限于发现地点,应该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选择一些生存环境相对较好、遗址规模较大的地点再作全覆盖的拉网式复查,力求找到当时的文化中心或者说主体遗址,同时确立附属于该中心的次中心或普通居址。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能进行一些水平较高的田野发掘,这样才能使这里的文化创新和在南北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得到合理的诠释。从这一点看,那些我们以前认为不会存在遗址的地方也应该引起我们关注,这也许是一个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的问题。

第二,需要加强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比较研

究,不同区域的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相互吸收对方的精华。三川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存与晋中盆地的发展基本同步,同时,与陕北地区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古文化也有着较密切的关系。若将视野扩大到整个黄河中上游地区,我们的比较研究就可以确立本地特色在整个史前时期文化发展中的时间、空间的定位。

第三,在文献中,尧舜时期已经有了许多“方国”部族,商王朝更对“鬼方”、“土方”和“工方”等方国进行过多次征伐,显然是一些具有一定规模和经济基础,并且有着较严密的组织机构的、具有初期国家性质的方国,抑或是一些目前我们还未认识的方国集团。吕梁一带应该存在着这样一些集团,而且,必然是以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延续,从时间传承和空间的传播两个方面研究什么机制造就了这样一些有别于中原文化、具有相当高水平的方国,是我们今后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

[1] 晋中考古队《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一地点发掘简报》、《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二、三、四地点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3期。

[2] 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晋中考古》,文物出版社,1998年;晋中考古队《山西娄烦、离石、柳林三县考古调查》,《文物》1989年第4期。

[3] 海金乐《晋中地区仰韶晚期文化遗存研究》,《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发掘资料,待刊。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吕梁市汉画像石博物馆)